

改寫史沫特萊： 從女權主義小說到無產階級小說

• 劉小莉

《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 是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 於1925至1926年間所寫的一部自傳體小說，該書英文足本由紐約的科沃德—麥卡恩 (Coward-McCann) 出版社於1929年首次出版^①。1973年，為了重新發現被湮沒的女性作家，女權主義出版社 (The Feminist Press) 重版了未經刪節的《大地的女兒》，並由洛特 (Paul Lauter) 寫了〈後記〉。此後，《大地的女兒》多次重版，一躍成為美國女性主義的經典文本，史沫特萊的寫作也受到美國文學界的重新肯定。足本《大地的女兒》由七章組成，以主人公瑪麗在丹麥海邊回憶自己有生以來三十年的痛苦經歷開始，以她與印度丈夫阿南德決裂，準備離開美國，出走丹麥結束。

中譯本《大地的女兒》主要有兩個版本：1932年林宜生譯本和1956年陶春杰校譯本。1978年以來，包括三聯書店重版本 (1981)、《史沫特萊文集2》收錄本 (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 和1991年末署譯者的單行本 (新華出版

社) 在內的諸多譯本，均出自1956年陶春杰校譯本。考察上述兩個譯本所依據的英文原本、譯文的完整程度、出版事項以及讀者接受情況等，可以看出：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在接受《大地的女兒》時有着不同的側重點。本文欲論證的是，1949年後，《大地的女兒》中譯本被作為「無產階級小說」出版和發行，對於消解這部作品的女性主義傾向，起着決定性作用。

一 1932年足本： 女權主義小說

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 of China*) 中稱楊銓 (即楊杏佛) 把《大地的女兒》譯成中文。《中國的戰歌》中譯者江楓對此進行了訂正。他指出，楊銓只寫了序，該書譯者是林宜生。此說屬實。但是江楓稱林宜生譯本不是全譯本，此說不當^②。

1928年底，史沫特萊從蘇聯進入位於中蘇邊境的滿洲，開始了她的中

1973年，女權主義出版社重版了未經刪節的《大地的女兒》，此後多次重版，一躍成為美國女性主義的經典文本。然而1949年後，《大地的女兒》中譯本被作為「無產階級小說」出版和發行，消解了這部作品的女性主義傾向。

國之行。1929至1936年初的大部分時間，史沫特萊定居上海。從1929到1933年，她作為德國《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駐中國特派記者，主要從事新聞採訪和報導活動。在這期間，她參與了蔡元培、宋慶齡、魯迅、胡適、林語堂、楊銓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曾為營救包括丁玲在內的進步作家、記者而奔走呼號^④。此間，史沫特萊與魯迅、茅盾、楊銓、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和交往。

1932年11月初，上海湖風書局出版了《大地的女兒》中譯本，譯者林宜生，在正文前有一句獻辭：「這譯本獻給努力奮鬥的青年男女們」。楊銓為這個中譯本寫了〈序〉。該譯本沒有註明原作的語種與版本，但是可以斷定，這個中文版本譯自1929年科沃德—麥卡恩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本，並且是未經刪節的全譯本。理由有三：第一，林宜生在〈譯後〉中提到，他是在民國十八年秋(1929)拿到《大地的女兒》原書的^⑤，此時史沫特萊已到上海^⑥，完全有可能以英文版《大地的女兒》贈送中國友人，或者通過這些人尋求中文譯者；第二，楊銓的〈序〉提到，「(《大地的女兒》)原書為英文，出版不到三年已經譯成德、俄、法、西班牙、荷蘭、波蘭、捷克斯拉夫七國文字。在翻譯或印刷中的尚有意、丹麥、瑞典四國文字(原文如此——筆者)。」^⑦由此可見，林宜生的譯文是譯自《大地的女兒》1929年英文版本；第三，把該譯本與1973、1987年女權主義出版社的兩個英文版本進行對照，可以看出，林譯本逐字對譯的現象相當突出，從內容、情節、結構到句子數量，都與

1973和1987年女權主義出版社的兩個重版本高度吻合。

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主要看重的是《大地的女兒》表現女性在私有制社會和男權制度下遭受身、心兩方面的摧殘，因而奮起反抗的內容和主題。他們認為這部自傳體小說致力於推動性別平等、婦女解放，並且主要面向女性讀者。

楊銓在〈序〉中認為，史沫特萊是一個「完全未受宗教勢力和道德觀念薰陶的野女子」，「是一個靠自己工作為生的婦女。她從做女兒做妻子，再回到獨身者的生活，嘗遍了現代社會給予獨立奮鬥婦女的苦辣。」他充分注意到了史沫特萊對於性、性別和婚姻所持的激進態度：鄙棄童貞與婦女貞操觀念；認為妻子不過是長期的賣淫者，而其所能擁有的自由，還不如娼妓。他指出，對於「專靠經濟或法律維繫的家庭」而言，史沫特萊的後一種觀點儘管偏激，但是不無道理。據此，他認為《大地的女兒》「不僅是婦女運動的急先鋒，並且是最近革命文學上第一流的作品。」他還指出，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和男女不平等的道德標準，不僅在中國存在，而且「在號稱進步的歐美也至今存在」；私產制度和貞操觀念，是男子壓服女子的「兩塊大石頭」。因而，婦女解放的當務之急是鏟除這兩塊「石頭」，而不是一些女權主義者所倡導的女子參政與女子承受遺產的權力^⑧。

在文章結尾，楊銓摘譯了史沫特萊本人為中文版《大地的女兒》所寫的序稿。史沫特萊在序稿中指出，《大地的女兒》之所以讓讀者感覺艱苦，原因在於作者本人所屬的美國勞動階

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主要看重的是《大地的女兒》表現女性在私有制社會和男權制度下遭受身、心兩方面的摧殘，因而奮起反抗的內容和主題。他們認為這部自傳體小說致力於推動性別平等、婦女解放，並且主要面向女性讀者。

級，其事實本就艱苦，而這些事實，不過是現代掠奪社會制度的反射。在這種制度之下，要希望男子與婦女間，男子與男子間，民族與民族間有健康的關係是絕對不可能的。史沫特萊在序稿中還表示，寫下這些事實，更堅定了她前進的信念^⑩。

林宜生也稱，「女主人公的刻苦奮鬥精神和作者文筆的健美」，提起他自己「不少勇氣」；他特別預祝女讀者讀了這書，「能夠增加其興趣，鼓起其勇氣，激勵其奮鬥進取的意志，以贏得人們的幸福。」^⑪

蕭紅有兩篇散文提到《大地的女兒》這部作品，一篇題為《〈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另一篇題為《〈大地的女兒〉——史沫特烈作》。蕭紅在《〈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一文提到，她所讀的《大地的女兒》封面「畫一個裸體的女子。她的周圍：一條紅，一條黃，一條黑，大概那表現的是地面的氣圈。她就這氣圈裏邊像是飛着。」^⑫蕭紅的這段描述與林譯本《大地的女兒》封面插圖基本相符。由此證明，蕭紅當時讀的是林譯本《大地的女兒》。蕭紅的短文《〈大地的女兒〉——史沫特烈作》集中評價了《大地的女兒》的主題和藝術成就。在這篇文章中，蕭紅肯定《大地的女兒》這本書「作得很好」。她指出，雖然這本書所記載的「多半是暴躁的聲音，狂暴的吵鬧、哭泣、飢餓、貧窮」，但是作者對這些題材進行了情感的過濾、理性的加工和思考，並且在寫作過程中重視文字的條理性、描述的脈絡性，所以給讀者的印象是：「她寫得可怕的样子一點也沒有。她是把他們很柔順的擺在那裏，而後慢慢的平平靜靜的把他們那為着打架而撕亂了



的頭髮，用筆一筆一筆的給他們舒展開來。」

蕭紅還指出，《大地的女兒》的思想深度在於，作者在這部書裏思考了、同時也促使讀者通過閱讀思考了書中人物哭泣的背後是甚麼、哭泣的原因是甚麼^⑬。此外，蕭紅提到，她曾和史沫特萊本人交流過書中人物形象的藝術加工問題。史沫特萊告訴蕭紅，她在這部作品中把痛苦縮小了，把實際上更壞的一個男性角色放鬆了，因為這個人物是一個印度人，而印度是一個弱小的民族。因此，蕭紅認為，史沫特萊「對不幸者永遠寄託着不可遏止的同情」^⑭。

蕭紅和史沫特萊所談論的「那個印度人」，顯然指《大地的女兒》第七章所寫的印度流亡者胡安^⑮。在小說中，胡安強姦了瑪麗，並以「不影響工作」為由，要求瑪麗發誓不把這件事告訴別的印度革命者，瑪麗答應了。但是，瑪麗獨立自主的行事方式、瑪麗所表現出的與男性革命者的「性別平等」、瑪麗與另一個叫阿南德的印度流亡者的結合，都遭到胡安

蕭紅曾和史沫特萊本人交流過書中人物形象的藝術加工問題。史沫特萊告訴蕭紅，她把實際上更壞的一個印度男性角色放鬆了，因為印度是一個弱小的民族。圖為1932年《大地的女兒》中譯本書影。

的嫉恨。一次開會，當瑪麗和阿南德與胡安在政治觀點上出現分歧時，胡安公開攻擊和污辱瑪麗的性別和身份，並且向阿南德和別的印度人歪曲和渲染他和瑪麗之間的性關係，誣衊瑪麗是個放蕩的女人。胡安的謾言毀掉了瑪麗和阿南德的婚姻，瑪麗也因此不再被允許為印度革命工作^⑭。

《《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一文，在介紹《大地的女兒》和《動亂時代》(*Tage der Unrast. Von Berlin ins Exil: Ein deutsches Mädchenleben 1914-1933*)的主要內容、部分情節和蕭紅本人的閱讀感受的同時，也穿插着當時蕭紅置身其中的上海抗戰情景和全國抗戰的時代背景。通過把這兩方面的內容並置起來，蕭紅實際上在引導女性讀者對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進行思考並作出回應：抗戰開始了，女性應該為抗戰勝利、為女性的平等解放、為遭受苦難的下層人民作些甚麼？正在經歷着殘酷的戰爭，耳聞目睹窮苦民眾的慘狀，使蕭紅覺得史沫特萊和麗洛琳克(Lilo Linke，《動亂時代》作者)是「勇敢的」，是「最強的」，因為作為女性，她們敢於和勇於把窮苦的人們，尤其是其中女性奮鬥、拼搏的歷程記錄下來^⑮。此外，蕭紅在同一篇散文中也描述了周圍的一些男性知識份子對這兩部作品的嘲笑：「《動亂的時代》……這位女作家就是兩匹馬嗎？」；「《大地的女兒》就這樣，不穿衣裳，看唉！看唉！」^⑯，並對此現象提出質疑：為甚麼這些人常常取着女子做嘲笑的題材呢？

從1929年史沫特萊抵達上海，到1933年6月楊銓在中央研究院的台階

上被國民黨特務槍殺為止，此間二人常有往來，建立了深厚的友誼^⑰。因此，楊銓對史沫特萊的思想傾向應該比較了解。此外，楊銓曾就讀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對於二十世紀20、30年代美國的女權主義運動也應該有所了解。從楊銓所寫的〈序〉來看，楊銓和史沫特萊都把婦女受壓迫的原因歸結到「私有制度」和「現代掠奪社會制度」，其用意顯然指向徹底的社會變革；而古德(Mike Gold)^⑱、考利(Malcolm Cowley)^⑲等美國批評家鼓勵和提倡全面反映美國工人階級生活的文學作品，其目標所指，是對既有體制的改革而非徹底變革。這說明此時中、美兩國接受《大地的女兒》的出發點、立足點和目的並不相同。第二，楊銓、林宜生、蕭紅等人，一致同意《大地的女兒》是一部能夠對女性讀者有所啟迪、使其有所獲益的作品，楊銓和蕭紅還認為這部作品能夠使人們認識到爭取性別平等、婦女解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與此不同，這個時期的美國批評家的着眼點是不分性別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生活和處境，因而很少關注婦女問題，缺乏性別視角。第三，楊銓在〈序〉中提到要求「女子參政與女子承受遺產的權力」的女權運動者，並對於後者「不從根本上謀鏟除解放女子的障礙」的失誤提出批評，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中國學者與第一次女權浪潮中的西方女權運動者之間，在認識上存有差異。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期，西方爭取女性財產繼承權和選舉權的女權主義者，主要代表的是白人中間階級女性的利益。對於這些人而言，她們及其家人有一定的財產，而法律

中、美兩國接受《大地的女兒》的出發點、立足點和目的並不相同。楊銓和蕭紅認為這部作品能夠使人們認識到爭取性別平等、婦女解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但這個時期的美國批評家的着眼點是不分性別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生活和處境，因而很少關注婦女問題，缺乏性別視角。

也相對能保障她們爭取自身權益的行動。而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人來說，法律是一紙空文，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國家淪亡的民族危機和國內政局的黑暗動蕩，使得徹底的、顛覆性的社會革命成為當務之急。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因為封建禮教、私有制度、政治腐朽而淪於社會底層、處境悲慘的事實，就成為控訴舊制度、要求社會變革、推動民主革命的重要動因之一。

所以，楊銓把史沫特萊追求女性獨立、抨擊婚姻與生育、拒絕承擔家庭義務、鄙棄童貞與婦女貞操觀念的言行，看作是反抗傳統思想和吃人禮教的革命行動。把文前的獻辭和楊銓的〈序〉結合起來，不難看出，這部中譯本實際上被賦予了「反抗封建禮教、反對家長專制」的時代主題。在這裏，西方的女權主義思想，融入了二十世紀前30年中國特定的文化、政治、國情等本土因素，擔當起了直面中國社會現實、具體問題和鼓舞廣大進步青年鬥志的歷史使命。但是，由於文化背景差異以及語言距離^②，史沫特萊並不認為楊銓領會了她寫作《大地的女兒》的本義。她在《中國的戰歌》中對楊銓撰文、發表講演推介《大地的女兒》表示感激，不過隨後又稱，「但是有時我注意到，對於我的書，他更感興趣的是其中道德上有悖倫常的地方，而不是其對社會問題的見解。」^③

二 1956年潔本： 無產階級小說

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大地的女兒》另一個中譯本。這個譯本



史沫特萊

註明校譯者是陶春杰，譯自科沃德—麥卡恩出版社1935年版本^④。該譯本共計六章，以主人公瑪麗在丹麥海邊回憶自己有生以來三十年的痛苦經歷開始，以瑪麗感到自己再也見不到前往歐洲戰場當炮灰的弟弟丹結束。與1932年中文譯本、1987年女權主義出版社的英文版本進行對照，這個譯本缺少整個第七章，也就是前文提及的、有關瑪麗參與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一章。未譯部分佔未刪節本全文的3/8。此外，這個譯本還有兩處刪節。一處是刪去了一段關於中國洗衣房的描述性文字，這段文字交代瑪麗在這個洗衣房裏學會了用漢語詛咒罵人，以及嘴裏含着水噴到衣物上^⑤。另一處刪去了瑪麗的一大段心理描寫：未滿十八歲的丹受不了飢餓的折磨，寫信向瑪麗求助，並說如果得不到幫助，就只好謊報年齡去當兵。瑪麗沒有錢幫助弟弟，躺在牀上思索，自己是否可以像海倫姨媽那樣去賣身賺錢^⑥。1956年的中譯本，在正文前面有一段署名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的〈出版說明〉。這個說明指出《大地的女兒》初版於1929年，其中譯本「曾於

1956年中譯本《大地的女兒》，建構了史沫特萊的「革命鬥士」形象，抹除了她的女權主義傾向，也清除了有損她個人形象的情節，為中國讀者樹立了這位「國際友人」的正面形象。

1932年由上海湖風書局印行初版」；但是，〈說明〉沒有指出兩個譯本的差異，並且稱這部自傳體小說寫的是史沫特萊「二十歲以前的生活」²⁶。這個版本，還有一段關於小說的〈內容說明〉，摘錄如下²⁷：

……作者的父母都是純樸勤勉的勞動人民，可是在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社會裏，不管他們怎樣辛勤勞動……可是這一家人最後仍舊免不了家破人亡。這種慘痛的經歷使她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對於資產階級統治者產生了不可調和的仇恨。最後，她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參加了工人運動，變成一個勇敢的革命者。

1956年中譯本由於缺少第七章，讀者看不到小說對於性、政治和革命之間的複雜關係的討論。《大地的女兒》變成了一部「純粹」的無產階級小說，寫的是史沫特萊「二十歲以前的生活」，主要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表達了作者對資產階級統治者的「不可調和的仇恨」。

1956年中譯本《大地的女兒》，建構了史沫特萊的「革命鬥士」形象，抹除了她的女權主義傾向，也清除了有損她個人形象的情節，為中國讀者樹立了這位「國際友人」的正面形象。

通過引文中「這本書所描寫的就是她（史沫特萊）在這時期的生活經歷」一句可以看出，1956年中譯本《大地的女兒》是被當作真實反映史沫特萊生平的作品介紹給新中國讀者的。換言之，小說主人公瑪麗的所作所為，被等同於史沫特萊本人從幼年到二十歲的經歷。由於刪去了1932年中譯本和1987年英文版本的第七章，讀者通過這個版本看到的，就只是主人公瑪麗（史沫特萊）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掙扎、成長和奮鬥，並一步步加深了對窮人的悲慘處境的不滿和同情、對富人的仇恨和反抗的過程。小說第六章寫瑪麗受拉遜兄弟的影響，參加社會主義者的集會、討論和反戰宣傳，懂得了窮人之所以「又醜又俗氣」，

是制度造成的。在1932年中譯本和1987年英文版本第七章中，敘述者講述了瑪麗對那些誇誇其談、沒有實際行動的社會主義者的失望和疏遠。但是如果不看第七章，讀者會誤認為，瑪麗完全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第六章中，瑪麗的大弟弟喬治做散工被塌下的土石砸死；瑪麗只能給小弟弟丹微薄的經濟資助，丹終於謊報年齡參軍，並被送往法國戰場，此後音信皆無。到第七章，丹從法國回來，僥幸撿回一條命，靠政府補償給退伍兵的一些薄田生活；瑪麗的妹妹碧兒崔麗斯從師範學校畢業，成了一名有正式收入的教師。正是由於刪去了第七章，1956年中譯本的〈內容說明〉才会有「這一家人最後仍舊免不了家破人亡」的說法。

1932年中譯本和1987年英文版本第七章主要記敘瑪麗參加印度民族革命運動所遭受的挫折和打擊。除了上文提到的瑪麗遭到印度革命者強姦、第二次婚姻失敗以外，小說還記敘了瑪麗因為掩護印度革命者被捕的經歷，刻畫了瑪麗的第二任丈夫阿南德（也是印度革命者）及其他印度革命者對女性的性別偏見、民族偏見以及性別雙重標準。由於1956年中譯本採用科沃德—麥卡恩出版社1935年的縮編本，使得瑪麗在革命活動中所遭遇的挫敗被完全清除，留給讀者的，是一個覺醒了的、奮發向上的革命者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由於缺少第七章，讀者看不到小說對於性、政治和革命之間的複雜關係的討論、對於女性情欲的思考、對於男性印度革命者的性別雙重標準的反思和批判等。這樣一來，前六章中瑪麗對於婚姻和家庭責

任的詛咒、對於性和生育的反感、對於父親的男權思想及其缺乏家庭責任感的行為的憎惡，都很容易被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罪惡。小說暴露和批判工人階級中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男權專制、思想上的麻木與蒙昧等劣根性的傾向就被抹掉了。正是由於上述的刪節，《大地的女兒》變成了一部「純粹」的無產階級小說，寫的是史沫特萊「二十歲以前的生活」，主要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表達了作者對資產階級統治者的「不可調和的仇恨」。

由於條件所限，筆者未能見到科沃德—麥卡恩出版社1935年出版的《大地的女兒》英文版本，無法判斷除了第七章外，1956年中譯本《大地的女兒》的另外兩處刪節，是1935年英文版本來就如此，還是在翻譯和出版過程中被刪除的。但是，可以看出，關於中國洗衣房的描述性文字，傳達的是中國人的負面形象——出言惡毒、沒有信仰、行為粗俗不雅。雖然〈出版說明〉稱史沫特萊的許多著作，「都是為了向西方人士介紹中國革命的真相而寫的」，但是這樣的「真相」，是有損中國人的正面形象的。所以，筆者認為，這段文字更有可能是中文翻譯或者出版過程中刪除的。至於為何刪去瑪麗的心理活動一段，似乎頗令人費解。在1932年中譯本和1987年英文版本中，瑪麗的這段心理描寫的大意是：在經濟拮据、又不願失去丹的情況下，她想到唯一能迅速賺錢的途徑，就是像海倫一樣去賣身；賣身要找那些有錢的人；但是到哪裏去找這些有錢人、應該怎樣說、怎樣做，都不清楚；因此，她覺得此路不通。

也就是說，瑪麗只是想到這條路，並沒有付諸行動。或許，對於刪節者而言，僅僅想到去做妓女，都是可恥的，有損一個無產階級女性的正面形象。

綜上所述，史沫特萊作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女權主義者、她激進的女權主義主張，正是隨着潔本《大地的女兒》的傳播而逐漸被抹除的。留下來的，是一個符號化了的「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和「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作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女權主義者、她激進的女權主義主張，正是隨着潔本《大地的女兒》的傳播而逐漸被抹除的。留下來的，是一個符號化了的「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和「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史沫特萊。

註釋

① Agnes Smedley, *Daughter of Earth*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7); 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31, 138;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3.

② 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著，江楓譯：《中國的戰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頁124，註2。

③④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69-136; 113-14.

④⑤ 林宜生：〈譯後〉，載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著，林宜生譯：《大地的女兒》(上海：湖風書局，1932)，頁2；3-4。

⑤ 史沫特萊於1929年5月到達上海。參見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140;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184。

⑥⑦⑧ 楊銓：〈序〉，載史沫特萊著，林宜生譯：《大地的女兒》，頁4；1-4；4-5。

⑨⑩⑪⑫ 范橋、盧今編：《蕭紅散文》（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頁356；382；358；356。

⑬ 傑倫在為《大地的女兒》所寫的書評中認為，女人們的哀痛構成了《大地的女兒》的合唱。傑倫的觀點可與蕭紅的觀點互為補充。參見Myra Jehlen, "Alone with Her Freedom", *New York Times*, 23 August 1987, A14。

⑭ 麥金農夫婦認為，這個人物的原型是印度人古普塔(Herambal Gupta)；普拉斯則認為該人物的原型是在塔什干城組建了印度共產黨的羅伊(M. N. Roy)。參見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42-45, 75-76。另參見此書中譯本：珍妮斯·麥金農、斯蒂芬·麥金農著，汪杉、郁林、方菲譯：《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份子的生平和時代》（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45-47、84-85；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60-61, 92-93, 104-107。

⑮ Agnes Smedley, *Daughter of Earth*, 290-99, 366-406。

⑯ 這段時間和史沫特萊、楊銓經常往來的還有徐志摩。參見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112-14。另參見史沫特萊著，江楓譯：《中國的戰歌》，頁122-24。

⑰ 古德於1930年代曾任《新群眾》(*New Masses*)編輯。他在此間撰文呼喚不同尋常的「紅色」作家的出現。他主張，擁有工人階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的作家，其寫作不應局限於無產階級藝術，而應該成為其環境的自然產物；這種作家應該以權威的方式——不管有多粗礪——言說其在廉價公寓、工廠、林區、鋼廠的經歷。他認為，史沫特萊就是這種作家中的一員。轉引自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183-84。

⑱ 考利於1930年代曾任《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編輯，為1935年《大地的女兒》英文版撰寫了〈前言〉。參見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252-53。

⑲ 直到1941年離開香港返回美國，史沫特萊能講的漢語仍極其有限。她在中國的活動，始終是借助於翻譯和懂英文的朋友展開的。

⑳ 1935年，科沃德—麥卡恩出版社重版了《大地的女兒》的縮編本，並由考利為其寫了前言。根據普拉斯的說法，這個縮編本刪去了小說的第七章。關於縮編的原因，麥金農夫婦的說法是，截至1934年5月，雖然《大地的女兒》在評論界獲得了稱讚，但是銷售情況不佳。而考利相信，如果對這部作品更好地進行縮寫和編輯，就會大受歡迎。普拉斯則認為，1930年代中期美國無產階級小說的風行，確立了史沫特萊作為美國左翼文學家的聲望。到1934年為止，該書已被譯成好幾種文字，成為左翼文學的經典之作，在左翼學生及積極份子之間流傳。參見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161;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251-53。

㉑ 參見史沫特萊著，林宜生譯：《大地的女兒》，頁224；Agnes Smedley, *Daughter of Earth*, 171。

㉒ 參見史沫特萊著，林宜生譯：《大地的女兒》，頁337-38；Agnes Smedley, *Daughter of Earth*, 253。

㉓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出版說明〉，載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著，陶春杰校譯：《大地的女兒》（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頁1-2。（着重號是筆者所加）

㉔ 〈內容說明〉，載史沫特萊著，陶春杰譯：《大地的女兒》，版權頁。

劉小莉 中山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2005級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中外文學。